

# 文史 活页



2024  
第 二 期  
总第二十七期



淮安市政协文化文史委 编印

峨眉山月半轮秋，  
影入平羌江水流。  
夜发清溪向三峡，  
思君不见下渝州。

永太心诗 周恩来  
一九六四年三月

## 征稿启事

《文史活页》是淮安市政协文化文史委文史资料征集与发布的平台。欢迎各级政协委员和社会各界人士，按政协文史资料的“三亲”要求，撰写或提供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自己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与政协工作相关的文史资料，或提供有价值的采编线索，有关稿件一经刊用，即奉薄酬。

---

电 话：83606052 83606013

投稿邮箱：[hazxsw@163.com](mailto:hazxsw@163.com)

联 系 人：朱维明 陈瑾 陈哲



周恩來詩歌、書法

蘇新出准印：S（2024）08000026

出版日期：2024年3月5日

## 纪念周恩来诞辰 126 周年专辑（二）

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 126 周年专辑二辑选了周恩来纪念馆管理局原局长、淮安市政协一级调研员张谨同志论述周恩来对新中国政治制度、政治协商、政风建设及党史宣传方面的文章，这些文章充分展现了周恩来同志杰出的政治智慧和对新中国政治建设与政治协商制度的重大贡献，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编者

目  
录

周恩来对新中国政治制度建设的奠基性贡献  
.....张 谨 / 1

试论周恩来与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政风建设  
.....张 谨 / 12

向周恩来学协商  
.....张 谨 / 30

周恩来与中共党史宣传  
.....张 谨 / 37

编  
委  
会

编委主任 徐效文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继峰 刘志平 朱维明 陈 哲

陈 瑾 陈寿青 周忠跃

主 编 马继峰

副 主 编 陈寿青

责任编辑 刘志平

编 辑 朱维明 陈 瑾

## 周恩来对新中国政治制度建设的奠基性贡献

◎张 谨

政治制度建设，是新中国建设的核心，是决定社会性质的关键要素。它的建设成效，事关国家政权的形象与稳固，事关社会的清明与和谐，事关民心的安宁、民意的伸张、民智的积聚，是立国施政的基础性工程。从新中国初创到1954年第一届人大召开这一段时间，可以说是新中国政治制度深度酝酿、精心设计、逐步构建和初步确立时期。在此过程中，周恩来一方面为了建设新中国，甩掉贫穷落后的帽子，夙夜在公，殚精竭虑，倾注了极大地热情和心血，建立了卓越功勋。同时为新中国的政治制度建设，呕心沥血，深谋远虑，汇集集体的智慧和人民的力量，凭借自身丰富的阅历和深入的思考，超前运筹，创新开拓，主动实践，作出了奠基性贡献。

## 一、筹备新政协会议，开启新中国政治制度建设的先导工程

《共同纲领》的酝酿与起草，是筹备新政协的重头戏。正如周恩来所说：起草共同纲领的任务很繁重，很紧迫，“必须加紧工作”。共同纲领将“决定联合政府的产生，也是各党派各团体合作的基础”。他从1948年就开始思考酝酿，1949年6月担任起草《共同纲领》的新政协筹备会第三小组组长，6月下旬在勤政殿“关”了一个星期左右，亲自执笔，写出全文。草稿写出之后，经过七次的反复讨论和修改，后又由陆续到达北平的政协代表五六百人分组讨论两次，第三小组讨论了三次，筹备会常务委员会讨论了两次，广泛地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见。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第二天周恩来代表第三小组在会上作了《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的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29日，政协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对新中国的民主政治制度作了十分明晰的勾画，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式产生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在普选的全国人代会召开以前，由全国政协会议执行全国人代会的职权。“在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



人民政府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纲领。《共同纲领》是中国人民的大宪章，它在—个时期内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

周恩来是筹备第一届政协的核心成员，是人民政协的创建者和开拓者。他对与民主党派的长期合作问题有着独到的见解。在1949年4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周恩来对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领导人坦诚地表示：“我们要长期合作，共同努力，建设新中国，完成历史所赋予的任务。”11月12日，他对农工民主党的人士说，农工民主党还有它的历史使命，不能让它无疾而终。12月6日，他针对民主党派领导人认为民主革命胜利了党派存在就没有必要，要求合并和取消的状况发表意见，指出：“民主党派在中国革命中是有贡献的，不论民盟或其他民主党派都应该继续存在下去。”1950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召开，周恩来作《关于外交和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再次强调：不能认为现阶段民主党派没有用了，就是到社会主义，民主党派还要跟我们—道走的。周恩来高度重视政协“对中央政府的工作起协商、参谋和推动的作用”，明确指出“协商这两个字非常好”，始终倡导要注重事前协商，“凡是重大的议案提出来总是事先有协商的”，“凡准备由政务院通过的重要决议和指示等，经常是在征询政协全国委员会有关小组的意见后，再提政务会议通过的”，重大情况如抗美援朝、国家建设等及时通报，重大事项如政协全国委员会工作条例等超前沟通、集思广益，反复征求

意见，以建立共识，形成合力。1950年3月16日，周恩来主持政务院党组干事会会议，议定同党外民主人士密切合作的指导原则，强调要使党外负责人加强责任感，在其职权范围内敢于做主。随着形势的发展，鼓励民主人士加紧投身国家建设，指出“民主党派的责任，就是要推动自己的成员积极地参加各自岗位上的建设工作”。

对人民政协的历史使命，周恩来作了清楚地描述：“在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后，政协才不再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但是它仍将以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而存在，国家大政方针，仍要经过人民政协协商。”1949年10月9日，周恩来亲自拟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工作条例（草案）》，毛泽东审阅后批示“即刻付印”。1954年12月，他主持政协二届一次会议，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在原来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提出了适合于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的纲领和组织原则，对人民政协的性质、任务和共同遵守的准则等作了明确规定。

### 二、倡导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促进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形成

新中国建立之初，由于条件受限，未能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而由全国政协代行人大职权。但周恩来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始终充满自信和期待，认为这一制度是新中国最合适的政权形式，并为此作了一系列构想和宣传。他主持起草的《共同

纲领》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权力属于人民”，“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对《共同纲领》作说明时，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制度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它完全不同于旧民主的议会制度。”1953年3月，在招待中国民革三中全会扩大会议代表时，周恩来再次重申：“人民代表大会制属于苏维埃工农代表大会制的体系，完全不同于资产阶级的议会制。”“人民代表大会，是经由人民选举出来的，是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至于如何选举，他设想“将来人民代表大会，是要经过普选方式来产生的”。“我们要做到真正的普选，不分性别，不搞种族歧视，不分宗教信仰，不论财产多寡和教育程度的高低，只要达到适当年龄，没有其他特别原因，便可参加普遍的选举。”

1952年12月24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常委会上作报告，提议由政协向中央人民政府建议，于1953年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开始进行起草选举法和宪法草案等准备工作。翌日，召集会议，研究全国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有关问题。将普选方针概况为“全党参加，政府出面，训练干部，发动群众深入宣传，认真选举，以达到民主建政的目的”。1953年1月，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0次会议上作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问题说明。指出，“建国初，《共同纲领》中就确定我们是人民代表大会制的人民政府”，“经过三年的努力，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只有尽快召开人民代表

大会，“才能进一步加强政府与人民之间的联系，使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更加完备”。会议一致通过《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周恩来担任刚刚成立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选举法起草委员会主席。1953年2月，周恩来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四次会议上所作报告指出：当前我们最迫切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动员全国人民积极准备和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以便充分地发挥全国人民的积极性，来共同奋斗。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经毛泽东主席提名，会议决定周恩来担任国务院总理。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中国的正式施行。

### 三、广泛团结与联合，重新集结新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在民主革命时期发挥了特殊作用，是党的三大法宝之一，也是构建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重要依托。新中国的创建，可以说是与爱国统一战线的重新集结同步进行的。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开展和负责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成员之一。新中国建立之初，他着力发挥自身优势，继往开来，全力推进统一战线工作展现新格局、新面貌，凝聚了人心，汇聚了力量，赢得了广泛的支持。他对统一战线的地位和作用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不失时机地扩大统一战线的影响，不遗余力地加强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和指导。在1950年4月召开的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上，他两次发表讲话，指出：“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应该更重视

统一战线问题。” “任何部门的工作都不能与统战工作相脱离。” 在 1951 年 1 月中共中央统战部举行的茶话会上，他特别强调“统战工作对人民民主专政，对党的整个事业有重大的作用”。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周恩来就把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有机地融合于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之中，贯穿于新政权组织的建设之中。新政协的代表构成，是新中国统一战线广泛性的集中表现。协商代表名单是一项十分复杂、细致的工作，关注度高，影响面大，既需要掌握条件又要兼顾平衡，不能有丝毫的疏忽与偏差。周恩来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前向代表所做的报告中指出：“这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具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性质，所以我们不得不对它更加慎重。” “这种谨慎是从政治上考虑的。” 因此，周恩来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和严谨的态度，慎重对待每一个人选的确立，对一些有复杂历史或特殊经历的人选的斟酌协商都亲自过问，不惜投入时间与精力，函电往来，再三磋商，直到各方认可、上下满意为止。1949 年 7 月 23 日，周恩来接到陈毅关于建议新政协代表中应照顾老解放区的开明绅士的电函，他随即复电，肯定“所提建议甚好，当引起注意”，并嘱如有这方面适当人选，请即提出。次日亲笔书信给中共中央统战部，就曹靖华等知名文化人、谢家荣等原国民党兵工专业人员的代表安排及其界别划定提出商量意见，征询妥帖方案。8 月中下旬，就新疆代表的酝酿产生，周恩来代表中央先后亲拟 7 份电文给中共中央驻新疆的联络员，对 5 名代表

中的少数民族安排提出建议，“希望维果（吾）尔族、卡（哈）萨克族均有人来，并有一位汉人同来兼做翻译”。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统筹权衡取舍，最终确定了45个单位的代表510名，候补代表77名，特别邀请代表75名。

在组建政务院机构的过程中，周恩来特别重视挑选一大批党外人士担任各种领导职务，一方面弥补党内管理人才不足的问题，一方面以这样的结构来增强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力量的团结与整合。在政务院副总理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两名；21名政务委员，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占11位；各部委院行署负责人93名，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占42位。他们中很多人都是由周恩来提名，并同各方面反复协商正式提出的。对黄炎培的“出山入阁”，他还亲自出马“三顾茅庐”，以极大的耐心加以劝导说服，最终黄同意出任公职。为了使这一体制得到有效施行，周恩来还提出“非党人士要有职有权”的要求，与非党人士共担治国理政重任，明确规定“政务院的政务会议每星期召开一次，有关文件等也交非党人士审查，一切指示、法令也要他们修改”。

#### 四、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有效推进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施行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肇始于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的建立，确立于《共同纲领》的制定。周恩来作为主要决策者和推行者之一，立足中国国情，总结成功实践，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尊重历史，顺应民意，实现了我国传统治理体制的超越。他反复强调我国实行民族区域

自治制度的必要性。1949年9月7日，在阐释国家制度时，明确指出：“中国的少数民族也应该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内，承认他们的自治权。”“任何民族都是有自决权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我们虽然不是联邦，但却主张民族区域自治，行使民族自治的权利。”他认为落实好民族政策是贯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关键。22日，在对《共同纲领》起草经过和特点作说明时，指出：新民主主义民族政策的“基本精神是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在各民族的大家庭中“必须经常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倾向”。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周恩来讲到民族关系问题时，特别告诫“民族政策应引起我们全党的注意”。多次强调要“根据《共同纲领》规定的民族政策来办事”，并提醒必须以审慎的态度对待民族问题，“比较重要的应该请示大行政区，更重大的必须请示中央”，“工作中要处处谨慎”，“不要冒失”，“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改革，要稳步前进，不能急躁”。他主张从实际出发、循序渐进地解决少数民族问题，指出：“我们不能要求各少数民族的发展水平和汉族一样，要承认少数民族在某些方面存在落后现象，不能求之过急。”“对少数民族首先要在政治上使他们求得解放，然后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再帮助他们发展，稳步前进。”周恩来充分肯定民族自治的方向是十分正确的。1953年8月，就绥远拟划归内蒙古统一领导事，他约有关负责同志谈话，指出：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都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自治对国内外影响很大，是成功的。这样使

少数民族感到祖国真正是大家庭。

新中国建立之初，百废待兴。周恩来在总揽全局的同时，十分注重帮助少数民族地区解决实际问题 and 现实困难，在政策上倾斜，在财力、物力上予以支持，推动少数民族地区与新中国发展同步。1950年4月27日，他专门会见藏族训练班学员，表示“中央人民政府一定要扶持和帮助少数民族把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起来，使少数民族生活改善”。第二天，他又主持政务院第30次政务会议，专题讨论西北少数民族工作，指出：“经济发达的汉族地区要帮助经济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要尊重人家的风俗习惯，对他们不要太苛刻。”时隔两个月，即6月26日，他再次就西北地区民族工作召开政务会议，针对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会商，如贸易、税收、物资、水利、救济、货币、人才等作出一系列扶持性的政策规定。1951年7月，就云南有些地区发生灾荒急需救济一事，发出指示：要认真贯彻中央扶持少数民族的政策，对其经济困难“必须予以大力解决”。“灾荒严重地区可随时报请专区以上政府有预算中所列救济粮内拨给，进行紧急救济。”还对粮食调度、粮食运输以及土产收购等具体事宜作出安排。

实际工作中，周恩来还高度重视少数民族的文化保护和传承，关心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落实好具体的保障措施。1950年7月间，他致函新疆省人民政府，要求嗣后所有省级机关一切行文、布告、案卷均需一律采用维汉对照，使用两种文字。11月，周恩来主持政务院第60次政务会议，批准《培养少数



民族干部试行方案》和《筹办中央民族学院的试行方案》，这标志着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干部的教育培养工作开始纳入正规化轨道。1951年5月16日，他签署《指示》，规定：为了加强民族团结，禁止民族间的歧视与侮辱，“对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加于少数民族的称谓及有关少数民族的地名、碑碣、匾联等，如带有歧视和侮辱少数民族意思者，应分别予以禁止、更改、封存或收管”。1952年2月，他主持政务院第125次政务会议，责成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应尽快确定文字改革的方针，以便推动和帮助尚无文字而有独立语言的少数民族创造文字的工作。这一系列行之有效政策举措的出台、落实，为在全国范围少数民族地区全面施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创造了必要条件。

## 试论周恩来与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政风建设

新中国成立伊始，创痕累累，百废待兴，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实现全国的最后解放，保障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应对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打开国门、开拓外交等，任务繁重而艰巨。但新政府初创，政府工作人员大都来自战争前线、来自农村根据地，尽管根正苗红，热情旺盛，但对城市普遍非常陌生，对行政管理更是严重缺乏经验；而少数旧体制留用人员，受着以往陈规陋习的束缚，一时积弊难以消除，惯性还会产生冲击波；翻身得解放的劳苦大众则对新社会充满期待，各阶层人士也对新政权高度关注，在审视中考察新旧，在比较中区分优劣。

面对这样的状况和挑战，作为集党政军要职于一身、千钧重任担于一肩的周恩来，在统揽国内与国际、除旧与布新两个大局的同时，义无反顾地担当政务院总理这一特殊角色。他高度重视政风建设，把政风建设当作巩固新生政权的刻不容缓急

事来抓，当作树立和维护人民政府崭新形象的要事来抓，当作跳出“历史周期律”、确保“进京赶考”不被退回的大事来抓，从广泛教育入手，从除积弊入手，建立新规，实施新政，并且身体力行，倡风气之先。新中国成立不到一年，就组织政府系统的整风。他函告毛泽东：整风“现各部门正在开始进行，集中注意力检查领导骨干及各部门本身业务中有关思想、政策、关系、作风的缺点和错误”。经过不懈努力，新政府由上而下呈现一股清新、和谐、蓬勃向上的局面。

### 一、坚持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中国革命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周恩来始终坚持这一原则。他曾说：“如果没有坚强的无产阶级的政党领导，即使以‘乡村为中心’也难免要失败，”“党的立场就是党的领导干部的立场。”新中国成立伊始，力量凝聚、方向引领、道路探索更离不开党的核心领导，周恩来自觉从党在政权中“居于领导地位”这一客观要求出发，从“党应该领导一切，党能够领导一切”这一根本原则出发，重视党的建设，接受党中央统一领导，妥善处理党政关系。

周恩来担任政务院总理不久，即着手组建政府系统党的组织。1950年1月，他主持召开政务院党组会议，宣布成立政务院党组干事会，并亲任书记。明确“政务院党组有三层组织，

即“政务院党组干事会、各委分党组干事会和各部党组小组”，各级党组织的首要任务是“把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贯彻下去”。1952年8月，针对一些政府部门未严格执行政务院关于所属部门定期向中共中央作报告制度的问题，专门以政务院党组干事会书记名义发出通知，强调各部门必须严格执行定期报告制度。他还于1953年2月，主持起草并于3月10日形成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规定今后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中共中央，并经过中央讨论和决定或批准以后，始将执行。

在实际工作中，周恩来率先垂范，把接受党中央领导作为自己的日常习惯和自觉行动。1952年10月，在爱国卫生运动开展之后，他及时将7、8、9三个月的工作情况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报告，对取得的成绩、存在的问题以及下一步的打算作了详细说明。在国际交往中，周恩来更是严守纪律，保持与国内外的密切联系，有情况随时向党中央主要领导报告。在1954年参加日内瓦会议的近4个月期间，周恩来先后向党中央发来请示报告文件若干份，时间长则10天1份，短则每天1份，谈判进展、交流互动以及临时出访情况一应俱全。1955年4月，在结束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后，他于昆明及时致电党中央并报

毛泽东，说明“出国半月，因时间仓促，工作紧张繁忙，许多重要会谈未能一一及时电告。现在昆明休息数日，并将重要会谈情况按专题写出分别电告”。于是，于4月底、5月初，不到一周时间先后整理并上报了《亚非会议关于政治问题的讨论经过》《关于出国后在各地商谈台湾问题的报告》《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等6份专题报告。

## 二、确立为人民服务宗旨

1946年，在纪念鲁迅逝世10周年大会上，周恩来发表演讲，号召“要像牛一样努力奋斗，为人民服务而死”。新中国成立后，他在签署的政务院文件中强调，各级人民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各级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是人民的勤务员。各级人民政府应该密切地联系人民群众，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新的政务院95名工作人员一到位，周恩来就在中南海勤政殿召集会议，谆谆告诫全体人员：中南海是过去封建皇帝呆的地方，在这个“黄圈圈”里都是穿黄马褂的人，是个与民隔绝又统治百姓的禁城。现在解放了，我们在中南海工作，就要打破往日的“黄圈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当真正的人民公仆，为人民服务。1955年10月，在会见比利时工商界朋友时，周恩来深有感慨地说：一切都必须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离开了人民什么都做不成。

周恩来把人民始终挂在心上。高度重视人民来信来访工

作，1951年6月，签署《政务院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明确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均要对外设立专门的问询室或接待室，并有专人负责，以此作为联系群众、倾听呼声、接受监督的桥梁和窗口。他对起初信访部门不愿公开挂牌的现象给予严肃批评，要求接待机构位置醒目，交通便利，方便群众。周恩来对老根据地人民感情深厚，1951年10月在接见老根据地代表时，充满深情地说：下了山不应该忘了山，进了城不应该忘了乡，如果忘了就是忘本。1952年1月，他以政务院名义作出指示，明确“无论从政治上或经济上都必须十分重视加强老根据地的工作，大力领导和扶植老根据地人民恢复与发展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

周恩来担任开国总理时虽已年逾半百，但仍以极大的热情忘我工作，为国家的兴盛、为人民的幸福夙兴夜寐、日理万机。1951年5月下旬，因操劳过度，积劳成疾，遵照毛泽东的建议和政治局的决定，不得不暂时离开工作岗位，到大连休养。在休养期间，他并没有完全放松，先后到当地军校、工厂和港口视察，走访群众，指导工作，去医院看望慰问志愿军伤病员。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周恩来还经常深入基层，了解下情，关心群众疾苦。1954年底，在晚上下班高峰，他带领身边工作人员从北京图书馆门前乘公交车，在市区绕行半圈，亲身体验和了解交通拥挤情况，并交代有关部门迅速研究落实解决办

法。1955年9月的一天晚上，他以一个普通顾客的身份来到新近落成的王府井百货大楼，同老职工刘志泉亲切交谈，了解其思想、工作和家庭情况。

### 三、倡导良好的学习风气

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周恩来一直注重学习。1939年1月，他在作统一战线报告时提出了六条守则，其中关键的一条就是“学习的精神”。在重庆期间，他撰写了《我的修养要则》，第一条就是“抓紧学习”。1950年9月，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为建国一周年举行的庆祝大会上作报告，报告中他欣喜地告诉与会者，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一年，“是全国人民卷入学习高潮的一年”，并郑重表示，“新中国的建设需要大量的有充分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的干部”，人民政府正在从“大规模地提高现有干部的文化水平”和“大规模地训练旧公务人员和知识分子”等三个方面解决这个问题。

建国之初，面临全新的环境、全新的任务和全新的挑战，政府机关的人员尤其要更新思想、补充知识、适应需要，周恩来多次强调要把学习摆上重要议事日程。1951年3月，他主持政务会议，在部署当前工作任务时，把加强学习作为四项任务之一进行重点安排，阐明“学习是提高和改造的中心环节”。对于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人，他毫不含糊地提出学习上的要求，“过去长期参加革命战争、有过很大功绩的干部，今后要

掌握现代化的技术，也一样要学习，都需要继续培养”。在1953年8月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上，周恩来再次发出了“老老实实地学习”的号令，出发点是“为了减少盲目性和少犯错误，就必须承认自己不行，老老实实地做小学生”，学习的基本内容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财政经济政策”，学习的主要对象是“有各种经验和知识的同志、工人和技术人员”以及“苏联专家”。同时，他还具有开明、开放的思想，主张“学习一切国家的长处”。1953年10月，周恩来在上海调研时，语重心长地对当地干部说：搞建设并不比打仗容易。当高级干部的，一定要下决心钻进去，由外行学成内行。

对于自身的学习，周恩来做到忙里偷闲、孜孜不倦。他身边工作人员曾经回忆说，他案头放着的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已经不知看了多少遍，许多地方圈点得密密麻麻，并写下了大量眉批。在他书桌上还放着两厚本《辞海》、一本全国地图和一本世界地图，随时备查。他坚持学以致用、学用结合的原则。治理淮河是新中国建立后水利建设的一项紧迫任务，为了摸清情况，他专门让秘书到北京图书馆找来《山阳县志》等古籍认真研读；朝鲜战争爆发，对新生的红色政权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周恩来作为政务院总理又兼任中央军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席，既要协同指挥战局，又要全力保障后勤，为了熟悉朝鲜的



气候条件和地势地貌，他特意安排秘书调阅《世界知识手册》；为了处理有关西藏问题，他还让秘书到勤政殿借来《清朝文献通考》进行查阅、研究。

#### 四、力求创造性工作

建设新中国是一项开创性事业，白手起家，在一张白纸上描绘发展蓝图，执政者不仅要同心戮力、艰苦奋斗，还要具有勇于探索、敢为人先的创造精神。1949年11月，周恩来对在中南海办公的政府全体机关工作人员说：人民政府一切工作都在草创中，没有前例可援，“我们不要像旧官僚那样，不用脑子，只是墨守成规，按部就班地办事”，明确要求“新政府的工作人员不仅要完成政府所决定的工作，还要负责改进这个机构。人民政府不仅要求工作人员有积极性，并且要求有创造性。”

新中国建立之初，为提高政府运行质量、提升工作效率，周恩来对机构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一系列开创性的制度设计和安排。1951年3月，在政务会议上，他强调要“精简机构，明确分工”，指出“精简的目的，是要达到人数少、做事多。精简的主要办法是，减少层次和分工负责”。1954年10月，他在主持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作《国务院的组织和工作问题》的报告时，再次强调“机构要精干，要把能力强的人更多地放到部委去，这样可以减少国务院的日常事务、文件

往来和文牍主义”。周恩来还对把政府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进行有益探索，在1949年10月，新中国刚刚诞生，就与有关负责同志议定成立政治法律委员会等专门机构事宜。1951年1月，就法规条例的形成问题，周恩来提出了建设性意见，指出：“对于法律条例，不要等它完全成熟再去颁布施行，基本成熟了即可拿到实践中试验，并在实施中逐步完善。”1951年7月，为了保护森林资源、杜绝乱砍乱伐现象，他特别提醒有关部门“一方面要教育，一方面要订出些法规来”。1955年1月，他明确指示，要求“政府各部门根据需要，着手建立法律室，在整理现行法规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法规编纂工作”。

在新中国成立伊始，周恩来殚精竭虑，以超人的智慧主持内政外交工作，打开了崭新局面。在政治建设上，他倾心投入，全程参与新政协和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亲自起草《共同纲领》和审定《政府工作报告》，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治国理政的大政方针。在经济建设上，他深谋远虑，主持制订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以远见卓识率先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为我国走向工业化铺平了道路，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在文化建设上，他统筹兼顾，确立“教育和卫生在先”的工作方针和艺术的“人民性和民族性”的指导思想，积极推进戏曲改革，高度重视各类人才的培养使用和知识分子作用的发挥。在外交领域，他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开创性地

提出“求同存异”的战略方针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推进世界和平、展示新中国的外交形象、扩大对外交往与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作出了巨大贡献。

### 五、坚持实事求是原则

实事求是，是中国革命不断走向成功、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秘诀，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也是周恩来一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新中国的大厦在一片废墟上建立，作为新中国的执政者怀着急切的心情，渴望迅速甩掉落后帽子，实现前所未有的赶超，这是一种单纯而普遍的心理。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特别是当经济建设有一些起色的情况下，决策者往往容易头脑发热，产生急躁冒进情绪。周恩来审时度势，保持冷静的思维和清醒的头脑，深入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为克服冒进之风、浮夸之风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1956年7月，在参加上海第一次党代会时，他深有感触地说：“如果在中央待久了，又不接触群众和实际，就会比地方容易犯官僚主义。中央的同志要常到地方来看看。”

1956年初，周恩来就敏感地发现经济发展中的苗头性问题，多次给有关部门和负责同志敲响警钟，防止急躁冒进现象的滋生。2月，他召集李富春、李先念等同志开会，就解决计划会议和财政会议存在的冒进问题提出意见，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积极性要鼓励，不能泼冷水，但各部门搞计划要实事求是，

不能超越客观可能，没有根据地乱提计划”。在之后不久召开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他态度鲜明地表示“绝不要提出提早实现工业化的口号”，“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十二年远景规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在讨论国务院关于检查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情况时，他再次重申“要贯彻实事求是精神，防止虚假现象”。尽管周恩来所坚持的反冒进正确主张在后来的实践中遇到很大阻力，甚至因此受到严重误解和严厉批评，但在几年后总结建国十年经验教训、纠正大跃进错误时，毛泽东主席深有感慨地说：1956年周恩来同志提出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3年余地，多么好啊！

周恩来还把实事求是精神贯穿于日常工作之中，坚持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反对好大喜功和官僚主义作风。1953年7月，国家出版总署擅自发出通知，要求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图书馆。针对这一不顾现实条件、完全脱离实际的错误主张，周恩来提出严厉批评，并坚决加以阻止。1953年8月，在讨论农田水利工作时，针对存在的好大喜功、不注意工程效益问题，他毫不含糊地说：“大工程要搞，但不能冒进、贪多。长远利益应当与眼前的利益相结合”。1956年初，全国从南到北都在大张旗鼓地推广新型农具双轮双铧犁，当他了解到这种农具在

南方有“水土不服”问题后，明确指示立即调减生产计划，“既然不行，何必提倡？”在深入基层调研时，为了了解实情，周恩来时常“采取袭击办法”。1956年7月，他曾对外宾介绍说，下基层有关同志“常常问我到哪里去，我总是临时决定，让他们不能预先准备，这样我就能看到我要看的東西”。

## 六、与党外人士真诚合作

许多追求真理、向往光明的党外人士在黑云压城的年代，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顽强地同黑恶势力作斗争，为争取民主、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当中不乏治国理政的精英人才，是建设新中国不可或缺的一支重要力量。在长期的交往与合作中，周恩来深知他们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新中国建立后，在政务领域，他注重强调加强统一战线工作，重视发挥党外人士的作用，密切交流，真诚合作，为新生的共和国的诞生与成长汇聚了强大力量。

1950年3月，周恩来主持召开政务院党组干事会会议，议定同党外民主人士密切合作的指导原则。明确要求“政务院机构中的党组会议不要代替行政会议，健全政务院各部门行政会议制度、办公制度和汇报制度，保证有一定的必要的形式。要使党外负责人加强责任感，在其职权范围内敢于做主”。1951年初，周恩来亲自部署，政务院就加强政府机关的统一战线工作，对政府各部门分别进行了一年多来党与非党人士合作关系

的检查。4月份专门发出通知，“将各部门党外工作人员所反映的意见和情况，汇集分发给各党组。希望对其中有关部分加强调查研究，并作认真而负责的处理，务使各种意见和问题均能有所交代，不使他们感到意见落空”。1951年6月，签署《政务院关于加强政府机关内部统一战线工作的几项具体规定》。规定指出：应定期检查，总结经验，对所发现的问题，务必及时处理，并向上级作综合汇报。1956年5月，在主持有各省市负责人参加的国务院第28次全体会议上，他就进一步大胆启用党外人士问题提出要求，指出：“共产党以外的其他党派的部级正职也需要相应增加。我们的政府是统一战线的政府，与各党派要长期合作下去，不仅安排部长时要注意，安排副部长时也要注意。”

在政务院的组建过程中，周恩来以自己与党外人士的广泛接触和深入了解，周密权衡，精心安排，做了大量举荐、说服工作，使一大批社会贤达、知名人士各得其所、人尽其才。党外人士在4名副总理中占了2位，在21名政务委员中占了11位，在93名部委负责人中占了42位，比重均达50%左右。特别是为了劝导党外人士的代表性人物黄炎培“出山”担任副总理，周恩来“三顾茅庐”，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耐心说服，最终达成共识。在实际工作中，他还全力支持党外人士积极作为，及时为他们撑腰壮胆、排忧解难。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宋庆龄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周恩来经常就国际、国内的重大问题与她商量。1953年3月，周恩来考虑为了能让国外了解新中国的真实情况，需要创办一个对外的刊物。鉴于宋庆龄的国际声望和办刊经验，他认为创办对外刊物的任务由宋庆龄承担最为合适，与之商量一拍即合。宋庆龄亲自确定刊名为《中国建设》。周恩来在发现水利部的文件上没有党外人士、时任水利部部长傅作义签名的不正常现象后，专门批示水利部：没有傅部长批示的文件一律无效，并批评了一些党员干部不顾党的统战工作、不让民主人士有职有权的错误做法。只要时间允许，周恩来每周都安排召开一次政务会议，就重大问题广泛征求意见，特别是听取党外人士的不同意见。他坦言“我们听到这些话就能够启发思想”，“我们管理着这么大的国家，就要注意听取各种意见”。著名爱国人士胡厥文亲切地称周恩来是自己的“第一知己”。

### 七、端正文风、会风

文风、会风是政风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它既关乎效率又体现作风与形象。新中国建立之初，任务艰巨繁重，工作千头万绪，繁文缛节是必须消除的劣习，文山会海是必须逾越的障碍。周恩来对政府机关的文风、会风高度关注，对发现的突出问题及时提出批评，坚决加以纠正。

1955年3月，周恩来毫不留情地指出国务院各部委行文中

存在的问题，历数了形形色色的具体表现。严厉批评说：“文字含糊不清楚，笼统而不明确，错杂而不准确；文法混乱无条理，错误或不通；文意常不合逻辑，更缺乏辩证；文风则生硬僵化，不生动活泼。”要求迅速整改这些“通病”。同年6月，在讨论政府部门的工作时，对一些部门会议太多的问题，他用事实说话，用数据敲警钟，一针见血地指出：“据十三个部、会、行统计，今年开了570多次专业会议，人数达5万多，共开了7920天。这个情况要通报，今年下半年一定要减少会议。”1953年9月，就一些单位滥发统计表格、干扰了工作正常进行问题，他还亲自签署指示，部署清理工作，明确要求：“为着建立科学统计工作，必须用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待调查统计，必须建立制度禁止乱发统计表格。”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作《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情况和第二个五年计划任务》报告时，周恩来再次对政府工作进行了反思与检讨，指出：“现在国务院各部门机构大，层次多，因而公文多，电报多，表格多，弄得下级机关疲于奔命。”他掷地有声地强调：“这样的官僚主义的现象必须迅速加以纠正。”

周恩来的个人文风和他一贯的行事风格一样，简洁、平实。建国初期，他在国事十分繁忙的情况下，亲自起草了大量文稿，包括电文、书信、讲稿，短文少则几十字，简明扼要，提纲挈领，言之有物，针对性强，让人一目了然；重要报告同样惜字



如金，条理清晰，逻辑性强，辩证关系精当，数据引用详实，分析透彻，情理交融。1949年12月，周恩来应邀到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作《关于外交政策的报告》。他亲拟的报告提纲，从外交思想、外交政策和外交约法3个方面展开，有形势分析、有问题阐述、有原则要求，但要点集中，词句凝练，文字稿仅不足3页纸。他召集的会议，准备充分，议题明确，在广泛听取意见、积极吸纳各方面智慧的基础上，集中归纳，凝聚共识。1951年11月，在回顾政务会议召开的成效时，他颇有心得地总结说：“两年来，政务院坚持每周举行一次政务会议，所进行的议程共有三百多项，通过的决定、法律条令各有80多个。凡准备由政务院通过的重要决议和指示等，经常是在征询政协全国委员会有关小组的意见后，再提政务会议通过的。”著名党外人士罗隆基曾就参加政务会议抒发感言，“不是政务会议上的什么事情我都有兴趣，也不是这个人那个人的讲话我都喜欢听，而是有一点深深地吸引了我，那就是在每次政务会议上，周总理总有一篇讲话，得到的效益很深很深，对我就像上了一课，所以我舍不得不来。”

## 八、厉行勤俭节约

这是“赶考”的重要考题之一。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是革命的传家宝，是“两个务必”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人民政府的应有本色。保持本色不仅对于克服眼前困难、共渡难关有着

现实意义，而且对于赢得民心、巩固新生的政权具有深远影响。对此，周恩来有着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警觉，1955年6月，他在审阅国务院有关领导起草的文稿时，专门添加了这样一句很有分量的话：“长期革命斗争中的艰苦朴素作风渐渐看不到了，这是社会主义建设中最危险的事情之一。”

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年年底，也就是1949年12月31日，政务院就发出公告，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在元旦和春节，除放假外，一律不许宴客、收送礼物，并不相互拜年。”在关键时间节点上公告于众，范围明确，要求具体，措辞严厉，新政府的新气象充分显现。周恩来对政府系统出现的问题毫不迁就，从头抓起，紧抓不放。在机构组建过程中，发现一些政府部门出现大量购房、甚至高价抢购问题，他指示通令政务院所属各部门，斥责“此等情事，殊为不当”，要求“凡需购房，均需向政务院呈报房屋情况和价目，经指定机关审批始得购买，否则以违法论”。1950年年底，当发现一些部门存在年终突击花钱问题时，他指示发出通令，对“浪费国家财力、破坏了国家的财经纪律”的现象给予严厉批评，并责令纠正。1951年7月，为规范对外接待工作，他批准印发改进办法，强调“一切招待必须是国货，必须节约朴素，切忌铺张华丽，有失革命精神和艰苦朴素作风”。

周恩来不仅对政府所属部门从严要求，反对铺张浪费，倡

导过紧日子，自身也率先垂范，勤俭节约，公私分明，与普通干部群众同甘共苦。从 1950 年起，他就亲自规定中南海因会议延误安排的工作餐一定是家常便菜，而且只能是“四菜一汤”，就餐人必须自交餐费和粮票，喝茶也得交费，本人均也不例外。这些规矩成为一种风尚，一直延续多年。周恩来尽管十分注重对外形象，但一件外套、一双皮鞋总是穿很多年，内衣、浴巾洗了又洗、补丁摞补丁也舍不得扔，时刻保持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周恩来对自己直接分管的部门更是盯得紧、抓得严，没有丝毫的偏袒和照顾，1950 年 11 月，他专门致信外交部办公厅负责同志，毫无商量余地地指出：“外交部修建太费，必须节俭。东楼应停止装饰。西楼不得加修，只修缮其破漏者。一切家具，不许购买。”

政风关乎党风，影响社会风气。建国初期，周恩来主导的政风建设卓有成效，与党风建设良性互动，催生了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持续向好，赢得了民心，赢得了主动，为新生的共和国迈好成长的第一步创造了极佳环境、奠定了重要基础。周恩来为此所作出的努力和探索，对于我们今天加强自身建设、改进领导作风，树立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形象，具有着重要的启发和借鉴作用。

## 向周恩来学协商

◎张 谨

协商，在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无处不在，它是一种方法、一种技巧、一种本领，小到家庭琐事、大到国际关系都须臾不能离开。在政治领域，在社会治理体系中，协商则是民主的实践，是民主的题中应有之义，它催生民主、推进民主，也彰显民主，因此我们常习惯称之为民主协商。通过民主协商，可以凝聚共识、增进团结，可以聚同化异、弥合分歧，可以汇集智慧、整合力量，可以助推协商民主制度的健全与完善。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

周恩来是我们党的统一战线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也是民主协商的积极倡导者和成功实践者。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

期，他都置身民主协商的第一线，勤于协商，善于协商，遵循“我们大家遇事总是要多商量”的原则，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成果，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学习与传承。

### 协商有“诚”

对协商要高度重视，要有发自内心的诚意。民主不只是一句口号，协商不只是一种姿态，而应当是高度自觉的主动作为，是具有明确目的性、预见性的实际行动。周恩来曾明确指出“协商这两个字非常好”。他始终倡导要注重事前协商，“凡是重大的议案提出来总是事先有协商的”，“凡准备由政务院通过的重要决议和指示等，经常是在征询政协全国委员会有关小组的意见后，再提政务会议通过的”。

新中国建立初期，为了筹备新政协，周恩来主持制订《共同纲领》，把协商贯穿于酝酿、起草、修改的全过程，面向各界人士，广泛征求意见，反复修改，不断完善。1949年6月下旬，他在勤政殿关了一个星期左右时间，亲自执笔，写出全文。接着就以深度协商的方式，安排先后到达北平的政协代表500多人分组讨论两次，召集极具代表性、汇集诸多社会名流的筹委会常务委员会和负责起草共同纲领的第三组分别讨论两次和三次，在基本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形成草案，提交筹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最终使《共同纲领》成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成为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历史性文献。

向周恩来学协商，首先要真协商。真协商是以团结合作为

宗旨，以发自内心的尊重和信任为基础，遇事想到协商，议事经过协商，协商在前，决策在后，不当摆设、不做样子，更不能当负担。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提高政治站位，从加强政治建设角度重视协商、开展协商，亲力亲为，精心安排每一次协商活动，认真对待每一个协商细节，高度关注每一条协商意见，确保协商时点有超前性、议题有精准性、结果有时效性。

### 协商有“方”

协商是思想的沟通，是情感的互动，必须讲究方法，因人制宜、因时制宜，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注重实际效果。在讲到统一战线的方法时，周恩来曾告诫：“我们要不失立场，但不争名位与形式；我们要坚持原则，但方法要机动灵活，以求达到成功。”

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建立，是事关贯彻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一件重大事件。在酝酿决策过程中，周恩来怀着极大的耐心，广泛征求意见，深入研讨，充分协商，逐步取得了共识。1957年3月20日，他邀请广西一部分人士集中讨论建立自治区问题；3月25日又亲自出席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召开的关于建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问题座谈会，并作长篇总结讲话。讲话全面阐释历史与现实状况，客观分析分合方案利弊，态度平和，晓之以理，使人们缩小了认识差距。而对于“有人提出采取公民投票”的意见，周恩来则毫不含糊地表明态度“那是不妥当的”，明确指出这种做法的危害是“可能对立起来，不利于团结，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在协商过程中，周恩来既注重循

循善诱，又坚持正面引导，始终将协商导向正确的方向。正如著名民主人士罗隆基所说：“每次政务会议上，周总理总有一篇讲话，教益很深，对我就像是上了一次大课”“对包括我在内的其他与会人员发表的并不正确的意见，采取极其高明的方式加以纠正，使人真正心悦诚服。”

向周恩来学协商，其次要会协商。协商不仅要有主动的热情和积极的态度，还要增强本领、提升能力。要能够把握大势，总览全局，高屋建瓴观察形势，知微见著发现问题，远离刻板与生硬，拒绝浮浅与乏味，既要乐于倾听，还要善于表达；既要能够包容，又要善于辨别；既要诚恳交流，又要善于引导，始终掌握协商的主动权、主导权。

### 协商有“量”

协商需要有气量、有胸怀，只有从良好的愿望出发，建立互信关系，平等相待，心灵互通，彼此尊重，才能推心置腹，吐真言，出真知，收实效。居高临下、自以为是、颐指气使是协商的大忌。周恩来指出，“要让党外人士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使他们在各种会议上敢于讲话”，“我们要吸收不同意见的人在一起，要善于和这些人一起协商，团结他们”。他还强调，“我们要知道，有不同的意见的人跟我们讨论、争论，真理才能愈辩愈明”，要“允许唱‘对台戏’”。

三门峡工程是黄河治理的关键性工程，是一根十分难啃的硬骨头。从设计到建设，一直争论不休。因为事关重大，周恩来认为争论很有必要。为了吸收各方面人士的意见，他于1958

年4月，在三门峡工地召开现场会，对设计方案进行深入讨论。会议结束时，他开宗明义地提出：开会的目的是要听取许多同志的意见，特别是反面的意见。尽管由于黄河地质和水情异常复杂，三门峡工程还是留下很多后遗症，但周恩来始终以真诚的态度，广开言路，与持不同意见的人士开展协商，包括对于诸如“黄河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这样四座皆惊的刺耳言语他都保持克制，耐心倾听，集思广益，竭尽所能让三门峡工程趋利避害，造福上下游人民。对于那些曾经立场完全对立的国民党将官，遇事周恩来也坚持以包容的态度与他们平等协商。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在西柏坡周恩来热情地对起义投诚的傅作义说，咱们从现在起就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有什么事情，有什么意见和想法，都可以提出来商量。为了做好中缅边界的勘界工作，从1956年下半年开始，周恩来多次邀请一些熟悉情况的专家、学者进行座谈，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这期间他还专门向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郑洞国等咨询情况、协商意见，并于1957年3月召开的政协二届三次全体会议上，作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专题报告，对着示意图讲解情况、介绍过程、征求意见。由于充分协商，科学决策，使中缅边界的划定问题得到圆满解决，并成为解决我国与周边国家边界问题的一个成功范例。

向周恩来学协商，再次要敢协商。各级领导干部要以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以包容之心，以兼听则明的态度，敢于协商、厉行协商，有面对协商的胆量和气量，放下身架，



敞开胸怀，积极主动地倾听各方面的不同意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那样“对各种意见和批评，只要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就要让大家讲，哪怕刺耳、尖锐一些，我们也要采取闻过则喜的态度，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断提高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减少盲目性和随意性。

### 协商有“恒”

协商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协商必须经常化、常态化。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以及人们对形势的认识判断是错综复杂，也是连续不断、反复呈现的。新中国建立初期，对于为什么每星期召开一次政务会议，周恩来曾经解释说，“难道我也是闲着没事了，高兴每个星期开一次会吗？不是的，这是有好处的”，“在那样的会议上有的是不同的意见……。我们听到这些话就能够启发思想。我们管理着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就要听取各种意见。”

政务会议由全体政务委员参加，而当时的政务委员共有 21 名，民主党派人士在其中占了一半以上，共有 11 名，政务会议其实就是一个固定的民主协商的有效平台。上个世纪 50 年代，新中国百废待兴，周恩来身兼数职，他从繁忙的党务、军务和国务中挤出时间，每星期安排召开一次政务会议，就是利用这个协商平台，就涉及国计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进行面对面的磋商，广泛汲取智慧，与民主党派杰出人士携手共担治国理政的重任。在 1951 年 11 月召开的 109 次政务会议上，周恩来总结说，两年来，政务院坚持每周举行一次政务会议，所进

行的议程共有 300 多项。直至 1954 年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举行，周恩来先后主持召开了 206 次政务会议，就许多内政外交的重大事项展开了充分协商，“使得一切比较重大的决定和法令，更能适合最大多数人的共同需要，在贯彻实施时也更能得到最大多数的拥护和协助”。1975 年 5 月，已身患重病的周恩来看到中央统战部报送的《关于组织爱国人士外出参观的请示报告》，在上面批示“征求一下本人和业务机关的意见后再定”，“不要通知一下了事”，事情虽小，却鲜明生动地体现了他一贯的“官而不显”的态度和协商精神。

向周恩来学协商，还要常协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是接续不断的，所有的工作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协商也必须形成制度、成为常态。各级领导干部要练好协商这一基本功，全局安排有计划，工作责任有分工，并与有关方面搞好对接，广泛搭建平台，拓宽沟通渠道，主动出题、敏锐接题、及时破题，遵循习总书记的要求，“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博采众长，趋利避害，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在协商中不断凝聚起推动发展的强大合力。

# 周恩来与中共党史宣传

◎张 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中共党史是中国革命历史的核心部分，它承载的是初心与使命，承载的是光荣与梦想，承载的是苦难与艰辛，应成为我们学习和宣传的重点内容。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诞生、成长、壮大光辉历程的亲历者、领导者、见证者，十分重视党的历史的宣传工作，强调“党的历史应当经常讲”，并进行了广泛的实践活动，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对我们今天开展党史宣传乃至研究工作具有很强的借鉴作用。

## 一、把党史宣传作为党内教育的必修课

在不同的革命历史时期、面对不同的考验和任务，周恩来总能审时度势，利用各种机会、借助各种平台，适时有针对性

地进行党史宣传，传播党史知识，开展党员教育，在革命和建设的关键时期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1937年，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在党的生日尚未明确的情况下，他首次选择7月1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上作专题报告，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6周年，追溯党的历史，分析中国共产党取得成就的原因，号召全党继往开来，开拓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局面。1940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用党史故事激励南方局留守重庆的同志，进行革命气节教育，专门讲了广州起义失败后陈铁军、周文勇刑场上婚礼的故事。延安整风期间，按照党中央要求，周恩来在重庆组织学习党的历史和党的路线，亲自讲述从建党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党史，一共讲了十多次，一直讲到南方局整风全部铺开以后。1944年3月，在延安中央党校作了两次党史报告。在党的七大会议上，结合研讨统一战线工作追忆党史。

新中国建立后，周恩来不仅多次在有一定规模、相当层次党的专门会议上作专题报告，还不失时机利用各种行业会议以及一些特殊场合进行党史宣传。1951年在给知识分子做报告时，围绕“立场问题”穿插讲党史。1971年4月和5月，在全国旅游工作会议、援外工作会议和教育工作会议召开期间，他先后会见代表、讲述党史，提出：“不能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同年8月，在广州友谊剧院观看演出时，他就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举办情况，向演出人员现场讲述当时党的历史和政策。

## 二、把亲历亲闻作为党史宣传的聚焦点

党的历史波澜壮阔，激动人心。周恩来在党史宣传中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基点，以时事热点为视角，充分利用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还原了真实细腻、形象生动的历史，让听者有身临其境之感，使党的教育具有精准之效。

周恩来 1924 年从欧洲回国后，就投入了大革命的洪流之中。在此期间，他几乎参与了当时所有国共合作的重大活动，与形形色色的代表人物有广泛接触和交往，对很多事件发生的来龙去脉都很清楚，并有清醒的认识。1943 年，他曾在重庆就这一时期国共关系情况作了现身说法式专题报告。在延安整风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学习中，对党的六大的看法出现了热烈的争论。周恩来认为“这是启发思想的一种争论，党内思想从来没有今天这样解放”。他觉得自己参加了六大的工作，是当时的主要负责人，应当比别人认识得更清楚些。因此，于 1944 年 3 月在延安中央党校作了《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报告。他的报告具有权威性，对形势与背景的交代依据充分，对会议成果及影响的分析可信可靠，对统一全党思想发挥了良好的导向作用。

1960 年 7 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北戴河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报告。在大革命时期，周恩来就与共产国际的代表有所接触，此后在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密切交流中又身处一线，还多次往来于上海与莫斯科、延安与莫斯科之间，与共产国际有着不解之缘。因此，

他对两者关系的了解是最为直接，感悟是最为真切的。报告以客观的历史站位，对共产国际三个时期的划分以及在不同时期对中国共产党所产生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所作出的判断和估价是令人信服、发人深省的。音乐舞蹈《东方红》通过歌舞的形式反映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 28 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历史，创作需要掌握大量的党史知识。在指导创作的过程中，周恩来不止一次给创作人员讲党的历史，谈自己的感受，告诉大家应该怎样认识和理解党的历史。他说：“我是跟着这段历史走过来的，所以，我有感受，能帮助你们提些意见。”

### 三、把总结经验教训作为党史宣传的重头戏

党史是营养剂，也是清醒剂。回望历史并非无谓的“念旧”，而是为了审视过往的轨迹，发现亮点、澄清误区，为重新出发找准方向、积蓄力量。周恩来在多次党史宣传中，不是单纯的传播历史故事，而是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上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以史为鉴，力求在新的起点上实现思想认识新的飞跃。

在 1937 年纪念建党 16 周年的报告中，他充满深情地说，中国共产党接受了欧战后俄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影响，站在新兴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农民基础上成长起来，成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与中国人民有根深蒂固的联系的党”。同时，他还系统总结了大革命时期的历史教训。1943 年春，周恩来在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干部学习会上作《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的报告，围绕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的详细过程，就特定时期共产党领导人在政治上、军事上、党务

上对国民党右派、中派所采取的三次“大让步”进行了冷静反思和深刻剖析。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报告中，用了较长篇幅专门讲了“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在《论统一战线》的报告中，从“敌人、队伍和司令官”三个方面阐述了经验教训。

1964年10月，他在大型歌舞《东方红》演出人员扩大会议上作报告，对党的三大作风和三大法宝做了进一步诠释和倡导，并特别指出：“我们不仅看到1949年以前三大法宝起了决定性作用，建国以后15年依然如此。”1972年6月，他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专门就党的历史教训作报告，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所发生的历次左倾、右倾路线错误形成的过程、造成的危害加以评价、论述和说明，使与会者从中得到深刻感悟和警醒。

#### 四、把客观真实作为党史宣传的生命线

对历史要有敬畏之心，不能凭想象演绎，更不能靠杜撰戏说。对于党的历史，更应以真实地还原赋予其恒久的生命，以客观地评判彰显其厚重的价值。周恩来在党史宣传中始终把握求真原则，不仅信息量大，而且可信度高，做到史实精确、过程精细、评述精准。

1943年《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报告，内容详实，线索清楚，事态起伏跌宕，各式人物粉墨登场，众生相刻画生动逼真，错综复杂的党际关系、人物关系清晰地呈现在人们眼前。在做《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报告前，周

周恩来考虑“对‘六大’的历史情况，有的我已记得不很清楚了，有的我已经忘记”，专门与在延安参加过‘六大’的“有些同志谈了一下”，共同回忆，核实印证有关史实，确保报告内容的真实可靠。1971年5月，他在给各地、各部门主管教育的负责人讲解党的历史时，以公正客观、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对一些党史人物和事件作了十分中肯的评价，指出：“陈独秀对建党有功，不能抹杀”，同时对朱德率部上井冈山、长征途中叶剑英反对张国焘分裂等给予充分肯定。

除了做讲演报告之外，周恩来对各种形式的党史宣传都以严谨审慎的态度严肃对待。1944年4月，他专门致信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就有关旅欧“少共”情况进行确认核实，指出“共二十三人，不是十三人”，并开列了所有人员名单及人生结局。1959年9月，他先后四次到中国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亲自反复审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党史陈列。1971年8月，对一幅准备对外发表的画有毛泽东、林彪在一起的题为《遵义会议》的油画，作出批示：“这是违反历史事实，应予否定。”1975年10月，在他病重住院期间，嘱咐秘书转告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晚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托王将此情况转达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修订编辑委员会，在写“杨度”这一人物条目中，须将此史实写入，以免淹没无闻。

### 五、把自我解剖作为党史宣传的“同期声”

敢于正视历史，暴露自身不足和伤疤，毫不留情地刀刃向



内、解剖自我，需要勇气和胆识。周恩来在党史宣传中经常把自己放进去，把自己所负责的工作放进去，以自我革命的精神，在总结教训中找准定位，以我为镜，以我为戒，追根溯源，作深刻的自我批评。

他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报告中，没有因为自己是会议的主要负责人而文过饰非、回避问题，在确认“‘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对的”同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六大’是有原则性错误的，对以后发生了坏的影响”，并从三个“不认识”和一个“没有”做了深刻剖析。1945年4月，周恩来经过深入思考和实践总结，在党的七大所作的《论统一战线》发言对党的统一战线历史作了系统回顾和精辟分析。而在此过程中，他没有忘记对自身问题的检讨，坦诚地说，自己在此期间“犯了不少错误”，“今天我讲统一战线的经验，觉得应该看到错误的严重性”，并毫无保留地做了具体剖析，指出：“当时在武汉做领导的同志，我也在内，着重在相信国民党的力量可以打胜仗，而轻视发展我们自己的力量；在战争上强调运动战，轻视游击战。”

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报告中，讲到南昌起义，他进行了冷静反思，指出：“南昌起义本身是正确的，但在领导思想上有错误，单纯军事行动，中心是城市观点，没有跟当地农民结合起来建立根据地的思想。”1972年6月，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在谈到王明左倾、右倾错误问题时，结合个人亲身经历，对自己作了严厉的剖析和检讨。

### 六、把照应现实作为党史宣传的落脚点

党史宣传是一项经常性的教育活动，必须常态化、制度化。然而，回望过去不单纯是为了留住记忆，温故是为了知新，回头看是为了向前走，现实需要是动因，有的放矢才能取得实效。周恩来在实践中，洞悉时势，把准不同时期各级党员干部的思想脉搏，适时针对性地开展党史宣传。他每一次影响深远的党史宣传活动，不仅给当时的受教育者心灵产生了强烈震撼，而且也成一件件不可磨灭的重大事件载入党史的史册。

1937年7月1日，在国难临头、民族处于危亡之际，为了推动党在继承优良传统、汲取革命教训的基础上自觉地担负起领导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周恩来作了《十六周年的中国共产党》的报告。1943年在重庆、1944年在延安，为了配合全党开展的整风运动，加强党的历史和党的路线学习，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他先后作了《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报告、《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报告，并在整风学习会议上作了5天报告。

1960年7月，在中苏关系严重对峙的背景下，周恩来用两天时间向各省、市、自治区委书记作关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的报告，告诉大家，不要因为当前国际共运中出现的问题而灰心，“各国的革命和建设，要靠各国人民自己的实践”，“要靠各国党自己独立思考”。林彪事件爆发后，为了促使那些在思想上还没有同错误路线完全划清界限的领导干部及早觉悟，同时增强党中央的凝聚力，维护团结稳定的大局，1972

年6月，周恩来连用5个晚上时间，给党政军高级干部作长篇报告，阐述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路线斗争的真实经过，谈个人认识和责任，产生了非同寻常的示范影响作用。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零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明确提出，要“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这是一个重大部署。在贯彻这一重大部署的过程中，我们要以周恩来对党史宣传的模范实践为引领，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南，立足现实，放眼未来，树立科学思维，传承红色基因，为奋进新征程、实现中国梦贡献智慧与力量。